

总主编
曾宪义
王利明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主编 朱力宇 张曙光

立法学

(第三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总主编 曾宪义 王利明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立法学

(第三版)

主 编 朱力宇 张曙光

撰稿人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朱力宇 叶传星

万其刚 董珍祥

张曙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立法学/朱力宇, 张曙光主编. 3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曾宪义, 王利明总主编)
ISBN 978-7-300-10425-6

I. 立…
II. ①朱…②张…
III. 立法-法的理论-高等学校-教材
IV. D9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33309 号

21 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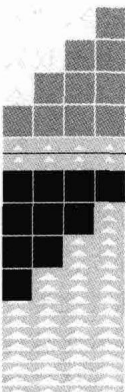
总主编 曾宪义 王利明

立法学 (第三版)

主编 朱力宇 张曙光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密兴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规 格	170mm×228mm 16 开本		2009 年 4 月第 3 版
印 张	19.5 插页 1	印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97 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总 序

曾宪义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

在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土地上,自从摆脱动物生活、开始用双手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用人类特有的灵性去思考以后,我们人类在不断改造客观世界、创造辉煌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人类的主观世界,逐渐形成了哲学思想、伦理道德、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一系列维系道德人心、维持一定社会秩序的精神规范,更创造了博大精深、义理精微的法律制度。应该说,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实地反映现实的要求。因而透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当时人们关于人、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组织以及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的思想与观点。同时,法律是一种具有国家强制力、约束力的社会规范,它以一种最明确的方式,对当时社会成员的言论或行动作出规范与要求,因而也清楚地反映了人类在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对于不同的人所作出的种种具体要求和限制。因此,从法律制度的发展变迁中,同样可以看到人类自身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历史轨迹。人类社会几千年的国家文明发展历史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法律制度乃是维系社会、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的工具。同时,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体现。

由于发展路径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东方社会与西方世界对于法律的意义、底蕴的理解、阐释存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在各自的发展过程



中，都曾比较注重法律的制定与完善。中国古代虽然被看成是“礼治”的社会、“人治”的世界，被认为是“只有刑，没有法”的时代，但从《法经》到《唐律疏议》、《大清律例》等数十部优秀成文法典的存在，充分说明了成文制定法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突出地位，唯这些成文法制所体现出的精神旨趣与现代法律文明有较大不同而已。时至20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东西文化交流加快，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理性精神的法律文明体系方成为现代社会的共识。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的数百年间，在西方、东方各主要国家里，伴随着社会变革的潮起潮落，法律改革运动也一直呈方兴未艾之势。

从历史上看，法律的文明、进步，取决于诸多的社会因素。东西方法律发展的历史均充分证明，推动法律文明进步的动力，是现实的社会生活，是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变迁；同时，法律内容、法律技术的发展，往往依赖于一大批法律专家以及更多的受过法律教育的社会成员的研究和推动。从这个角度看，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对于法律文明的发展进步，也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在现代国家的国民教育体系和科学研究体系中，开始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肇始于19世纪末的晚清时代。清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开办的天津中西学堂，首次开设法科并招收学生，虽然规模较小，但仍可以视为中国最早的近代法学教育机构（天津中西学堂后改名为北洋大学，又发展为天津大学）。三年后，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有“维新骄子”之称的梁启超先生即在湖南《湘报》上发表题为《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的文章，用他惯有的富有感染力的激情文字，呼唤国人重视法学，发明法学，讲求法学。梁先生是清代末年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巨子，在他的辉煌的学术生涯中，法学并非其专攻，但他仍以敏锐的眼光，预见到了新世纪中国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发展。数年以后，清廷在内外压力之下，被迫宣布实施“新政”，推动变法修律。以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在近十年的变法修律过程中，在大量翻译西方法学著作，引进西方法律观念，有限度地改造中国传统的法律体制的同时，也开始推动中国早期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20世纪初，中国最早设立的三所大学——北洋大学、京师大学堂、山西大学堂均设有法科或法律学科目，以期“端正方向，培养通才”。1906年，应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奏请，清政府在京师正式设立中国第一所专门的法政教育机构——京师法律学堂。次年，另一所法政学堂——直属清政府学部的京师法政学堂也正式招生。这些大学法科及法律、法政学堂的设立，应该是中国历史上近代意义上的正规专门法学教育的滥觞。

自清末以来，中国的法学教育作为法律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的曲折发展，经历了极不平坦的发展历程。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一直充斥着各种矛盾和斗争。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沉重压力之下，中国人民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花费了无穷的心力，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从客观上

看,长期的社会骚动和频繁的政治变迁曾给中国的法治与法学带来过极大的消极影响。直至70年代末期,以“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为标志,中国社会从政治阵痛中清醒过来,开始用理性的目光重新审视中国的过去,规划国家和社会的未来,中国由此进入长期稳定、和平发展的大好时期,以这种大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中国的法学教育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从宏观上看,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的法学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就是辉煌的。首先,经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在中国法学界迅速清除了极左思潮及苏联法学模式的一些消极影响,根据本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国家民族的共识,这为中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其次,随着法学禁区的不断被打破、法学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学学科体系已经建立起来。理论法学、部门法学各学科基本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框架,一些随着法学研究逐渐深入而出现的法学子学科、法学边缘学科也渐次成型。1997年,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部高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对原有专业目录进行了又一次大幅度调整,决定自1999年起法学类本科只设一个单一的法学专业,按照一个专业招生,从而使法学学科的布局更加科学和合理。同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确定了法学专业本科教学的14门核心课程,加上其他必修、选修课程的配合,由此形成了一个传统与更新并重、能够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教学体系。法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及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设置、课程教学和培养体系也日臻完善。再次,法学教育的规模迅速扩大,层次日趋齐全,结构日臻合理。目前中国有六百余所普通高等院校设置了法律院系或法律本科专业,在校本科学生和研究生已达二十余万人。除本科生外,在一些全国知名的法律院校,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已经逐步成为培养的重点。

众所周知,法律的进步、法治的完善,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工程。一方面,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为法律的进步、变迁提供动力,提供社会的土壤。另一方面,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发展,直接推动法律进步的进程。同时,全民法律意识、法律素质的提高,则是实现法治国理想的关键的、决定性的因素。在社会发展、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等几个攸关法律进步的重要环节中,法学教育无疑处于核心的、基础的地位。中国法学教育过去二十多年所走过的历程令人激动,所取得的成就也足资我们自豪。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21世纪,我们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和更灿烂的前景。“建设世界一流法学教育”,任重道远。

首先,法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以法治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也就成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势必要对法学教育、法学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要求。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期目标已顺利实现。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国家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比如说社会主义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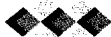


经济秩序的真正建立、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政治体制的完善、全民道德价值的重建、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等等，也已经开始浮现出来。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无疑最终都会归结到法律制度的完善上来。建立一套完善、合理的法律制度，构建理想的和谐社会，乃一项持久而庞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努力。其中的基础性工作，如理论的论证、框架的设计、具体规范的拟订、法律实施中的纠偏等等，则有赖于法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高素质人才特别是法律人才的养成，而培养法律人才的任务，则是法学教育的直接责任。

其次，21世纪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纪。20世纪中叶发生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极大地改变着我们的世界。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并由此引发许多人类从未面对过的问题。就法学教育而言，在21世纪所要面临的，不仅是教学内容、研究对象的多元化问题，而且还有培养对象、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教学方式的多元化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法学界去思考、去探索。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建立于1950年，是新中国诞生后创办的第一所正规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在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以其雄厚的学术力量、严谨求实的学风、高水平的教学质量以及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全国法学教育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并开始跻身于世界著名法学院之林。据初步统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已经为国家培养法学专业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一万余人，培养各类成人法科学生三十余万人。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学术优势，在现职教师中，既有一批资深望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法学前辈，更有一大批在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法学家。这些老中青法学专家多年来在勤奋研究法学理论的同时，也积极投身于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对国家法制建设贡献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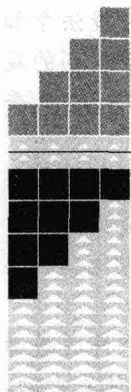
有鉴于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研究协商，决定结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学术优势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出版力量，出版一套“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自1998年开始编写出版本科教材，包括按照国家教育部所确定的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和其所颁布印发的《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基本要求》而编写的14门核心课程教材，也包括法学各领域、各新兴学科教材及教学参考书和案例分析在内，到2000年12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召开举世瞩目的“21世纪世界百所著名大学法学院院长论坛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之时，业已出版了50本作为50周年院庆献礼，到现在总共出版了80本。为了进一步适应高等法学教育发展的形势和教学改革的需要，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决定将这套教材扩大为四个系列，即：“本科生用书”、“法学研究生用书”、“法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用书”以及“司法考试用书”，总数将达二百多本。我们设想，本套教材的编写，将更加注意“高水准”与“适用性”的合理结合。首先，本套教材将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具有全国影响的各学科的学术带头



人领衔，约请全国高校优秀学者参加，形成学术实力强大的编写阵容。同时，在编写教材时，将注意吸收中国法学研究的最新的学术成果，注意国际学术发展的最新动向，力求使教材内容能够站在 21 世纪的学术前沿，反映各学科成熟的理论，体现中国法学的水平。其次，本套教材在编写时，将针对新时期学生特点，将思想性、学术性、新颖性、可读性有机结合起来，注意运用典型生动的案例、简明流畅的语言去阐释法律理论与法律制度。

我们期望并且相信，经过组织者、编写者、出版者的共同努力，这套法学教材将以其质量效应、规模效应，力求成为奉献给新世纪的精品教材，我们诚挚地祈望得到方家和广大读者的教正。

2006 年 7 月 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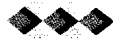


序 言

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并居于先导性的战略地位。在我国社会转型的新世纪、新阶段，法学教育不仅要为建设高素质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服务，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培养大批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高层次法律人才。近年来，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法科数量增长很快，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培养层次日渐完善，目前已经形成了涵盖本科生、第二学士学位生、法学硕士研究生、法律硕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研究生的完整的法学人才培养体系，接受法科教育已经成为莘莘学子的优先选择之一。随着中国法治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法学教育的事业大有可为，中国法学教育的前途充满光明。

教育的基本功能在于育人，在于塑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法学教育的宗旨并非培养只会机械适用法律的“工匠”，而承载着培养追求正义、知法懂法、忠于法律、廉洁自律的法律人的任务。要完成法学教育的使命，首先必须认真抓好教材建设。我始终认为，教材是实现教育功能的重要工具和媒介，法学教材不仅仅是法学知识传承的载体，而且是规范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对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第一，法学教材是传授法学基本知识的工具。初学法律，既要有好的老师，又要有好的教材。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言：“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能够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一套好的教材，能够高屋建瓴地展示法律的体系，能够准确简明地阐释法律的逻辑，能够深入浅出地叙述法律的精要，能够生动贴切地表达深奥的法理。所以，法学教材是学生学习法律的向导，是学生步入法律殿堂的阶梯。如果在入门之初教材就有偏颇之处，就可能误人子弟，学生日后还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来修正已经形成的错误观念。



第二,法学教材是传播法律价值理念的载体。好的法学教材不仅要传授法学知识,更要传播法律的精神和法治的理念,例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尊重权利的观念。本科、研究生阶段的青年学子,正处在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阶段,一套优秀的法学教材,对于他们价值观的塑造和健全人格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法学教材是形成职业共同体的主要条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赖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生成。一套好的法学教材,向法律研习者传授共同的知识,这对于培养一个接受共同的价值理念、共同的法律思维、共同的话语体系的法律共同体,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四,法学教材是所有法律研习者的良师益友。没有好的教材,一个好的教师或可弥补教材的欠缺和不足,但对那些没有老师指导的自学者而言,教材就是老师,其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评价体系中,教材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注重,对学术成果的形式优先考虑的往往是专著而非教材。在不少人的观念中,教材与创新、与学术精品甚至与学术无缘。其实,要真正写出一部好的教材,其难度之大、工作之艰辛、影响之深远,绝不低于一部优秀的专著,它甚至可以成为在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的传世之作。以查士丁尼的《法学阶梯》为例,所谓法学阶梯,即法学入门之义,就是一部教材。但它概括了罗马法的精髓,千百年来,一直是人们研习罗马法最基本的著述。日本著名学者我妻荣说过,大学教授有两大任务:一是写出自己熟悉的专业及学术领域的讲义乃至教科书;二是选择自己最有兴趣、最看重的题目,集中精力进行终生的研究。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写出一部好教材,必须要对相关领域形成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还要能以深入浅出的语言将问题讲清楚、讲明白。没有编写教材的基本功,实际上也很难写出优秀的专著。当然,也只有对每一个专题都有一定研究,才能形成对这个学术领域的完整把握。

虽然近几年我国法学教育发展迅速,成绩显著,但是法学教育也面临许多挑战。各个学校的师资队伍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这就更需要推出更多的结构严谨、内容全面、角度各有侧重、能够适应不同需求的法学教材,为提高法学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保障法学教育健康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长期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始终高度重视教材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所正规的法学教育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最早开设了社会主义法学教学课堂,编写了第一套社会主义法学讲义,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法学本科生和各科的硕士生、博士生,产生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因此被誉为“新中国法学教育的工作母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法律人才,并为法学事业的振兴和繁荣作出了卓越贡献,也因此成为引领中国法学教育的重镇、凝聚国内法律人才的平台和沟通中外法学交流的窗口,并在世界知名法学院行列中崭露头角。为了对中国法学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出版一套体现我们最新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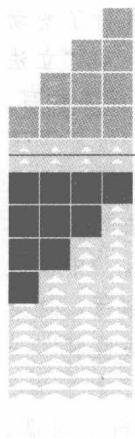


成果的法学教材。

承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我们组织编写了本套教材，其中包括本科生用书、法律硕士研究生用书、法学研究生用书和司法考试用书四大系列，分别面向不同层次法科教育需求。编写人员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师为主，反映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整体的研究实力和学术视野。相信本套教材的出版，一定能够为新时期法学教育的繁荣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是为序。

2006年7月10日



第三版修订说明

本书自2001年9月出版以来,于2006年5月进行了修订,出版了第二版。第二版在保持第一版内容基本不变的基础上,根据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和国内外立法理论和实际的发展情况,为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到二〇一〇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目标和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根据新的法律条文规定对原有内容进行了相应的改动,对第一版中存在的少数文字错误进行了订正;对第一版中引用的某些数据进行了更新。总之,第二版在总体上对第一版未作大的变动。

相比之下,第三版的修改力度更大。这是因为,在这几年中,国内外立法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变化同样很大。例如,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即已经基本完成了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提出的立法目标。又如,近几年我国在立法民主化与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和做法方面有许多创新和发展,包括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委员长会议决定,今后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实现了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的常态化、普遍化和制度化。这些都需要我们在立法理论方面予以说明,在立法实践方面予以描述。可以说,在保持本书原来的基本框架、基本内容、基本风格的基础上,及时、准确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立法的发展、变化和创新,是第三版修改所力求实现的意图。具体而言,第三版由主编朱力宇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修改:

第一,在“立法理论”一编中,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目标、理论的新提法,对“立法原则和立法的指导思想”、“立法与利益”、“立法民主化与公众参与立法”等章节的相关内容进行了改写。

第二,在“立法制度”一编中,增加了“立法效力”一章,成为第八章,并且将第二版中第七章第五节“法的位阶”的内容并入该章。这样的增加和调整更有利于反映我国现行立法制度的规定,也有助于学生理解和解决立法实际中经常存在的立法冲突问题。

第三,在“立法过程”一编中,对第二版的某些章节的结构和顺序进行了变动和调整。例如,将第二版中第五章的第五节“立法听证制度”调至第十一章“立法协调”,作为第三节;并且根据我国近几年立法举行立法听证会的实践进行了改写。立法听证制度是公民民主参与立法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立法过程中进行协调、折中、谈判、表达意见的重要手段。考虑到本书改写的该制度的内容更侧重于使学生了解立法听证会是如何举行的,即更侧重立法听证制度的实践而非理论,所以还是将其从“立法理论”一编调出更妥当些。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已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生活中一项极为重要的法律,当然也需要在“立法监督”一章中有所反映和介绍。

第四,在“立法技术”一编中,将第二版的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进行了对调,即成为第三版的第十四章“立法与法律渊源、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和第十五章“规范性文件的结构与形式”。这样调整的原因是,从教师讲授和学生理解来说,可以体现出从宏观立法技术到微观立法技术的逻辑。也就是说,从讲解立法如何体现法律渊源、法律体系和法律规范的整体技术,到讲解如何构造一部规范性文件的具体技术,再到讲解如何表达某些立法语言的细微技术,可能更妥当些。同时,第十四章的标题与第二版不同,也说明其内容有变化,主要是将第二版中第十章第二节“立法的内部协调”调至了本章。立法的内部协调主要是指法律渊源内部要协调、法律体系内部要协调、法律体系和法律渊源之间要协调以及法的内部结构要协调,这些问题在这一层次上都属于立法技术的范畴。而第十一章所要论述的立法协调,是立法过程中的协调,即协调立法主体、立法参与者、人民群众之间的不同利益、诉求和意见。

第五,按照出版社统一体例的要求,在每章最后都增加设置了“课堂讨论案例”。出版社的编辑“考虑到立法学这一学科的特殊性,案例可能很少”,建议“加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如背景资料、资料分析等”,第三版的修改采纳了编辑的这一宝贵意见。所以,读者看到的案例并非严格或纯粹意义上的案例。例如,第十章的“课堂讨论案例”就是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

第六,对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的少数文字错误进行订正,对某些数据进行更新,也是第三版或任何书籍教材再版修订时所必需的。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在原第一、二版中曾经提到过的我国立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些已经获得了解决或部分解决,在第三版中自然就不需要保留了。例如过去人大代表在审议议案时存在的准备不充分、发言随便等现象,现在已经基本没有了。所以关于这部分的一些文字当然就删改掉了。

最后,在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们负责任的态度和严谨的工作表示感谢的同时,还需要声明的是,我们衷心希望读者对本版仍然会存在的这样那样的错误或不当之处,提出中肯的批评。



第三版修改后本书各章节的撰稿人是（以撰写章节的先后为序）：

朱力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负责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一节、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六节、第十一章第三节和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撰写；

叶传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负责第四章和第十三章的撰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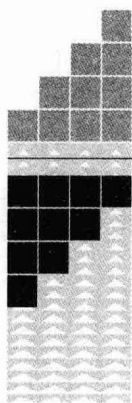
万其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二局处长，法学博士），负责第五章第二、三、四节，第九章第一、二、三、四、五、七节，第十章和第十一章第一、二节的撰写；

董珍祥（全国人大培训中心处长，法学硕士），负责第十二章第二、三、四节，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的撰写；

张曙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硕士），负责第十四章的撰写。

编著者

2009年2月



编写说明

实行和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奋斗目标的前提和基础条件，是要有法可依。因此，必须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本书以我国社会主义立法为重点，对立法原理、立法制度、立法过程和立法技术等立法学的基本内容，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论述。本书在参考国内外有关立法学著述的基础上，力图从理论与应用、历史与现实、国内与国外、静态与动态、宏观与微观等相结合的角度，对各种立法活动及其规律进行科学的说明和综合性的研究，也力图写出自己的特色。本书的编写人员既有在高校长期从事立法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有在实际立法部门进行立法工作的有丰富经验的工作者。因此，本书既可以满足高校本科生教学的需要，也适合在研究机构和实际部门工作的人员阅读。

本书各章节的撰稿人是（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

朱力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负责绪论、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和第十章第一节的撰写。

叶传星，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负责第四章、第十一章的撰写。

万其刚，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综合室副处长，法学硕士；负责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的撰写。

董珍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培训中心处长，法学硕士；负责第十章第二、三、四节和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的撰写。

张曙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负责第十三章的撰写。

全书由朱力宇统稿和定稿。如有不当之处，衷心欢迎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编著者

2001年7月

目 录

绪 论

立法学概述	1
第一节 立法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2
第二节 立法学的产生和形成	4
第三节 立法学在法学体系中的地位及学习和 研究立法学的意义	9

第一编 立法理论

第一章

立法的概念、本质和作用	17
第一节 立法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18
第二节 立法的本质与法的形成	20
第三节 立法的职能与作用	27

第二章

立法的历史发展	32
第一节 立法的产生	33
第二节 不同历史类型国家立法的发展	36
第三节 从古代立法到近现代立法发展的若干规律	50

第三章

立法原则和立法的指导思想	54
第一节 立法原则概述	55
第二节 我国立法的指导思想	58
第三节 我国的法定立法原则	63

第四章

立法与利益	73
第一节 法与利益的一般关系	74
第二节 立法中的利益选择和协调	76
第三节 立法与利益群体	80

第五章

立法民主化与公众参与立法	86
第一节 立法的民主化及其理论	87
第二节 我国立法的民主化概述	90
第三节 我国公民参与立法的形式	92
第四节 公布法律草案征求意见	95

第二编 立法制度

第六章

立法主体	101
第一节 立法主体概述	102
第二节 我国的立法主体	105
第三节 立法机关	107

第七章

立法体制	115
------------	-----